

叶利钦执政年代的结束与俄国的政治前景

黄宗良

一、对叶政治生涯和两个选举的一般预测

叶利钦气数将尽。此话双关：指其健康状况——俄报说叶已到了连签署文件都力不从心的地步；也指其政治生涯——按法律规定，叶明年任期已满，不能再连任，而民意测验中，他的支持率近乎零。于是，国内外普遍下了如上断语。

对于今年12月的杜马选举和明年的总统选举，国内外一般预测如下：

杜马选举：“祖国——全俄罗斯”和俄共将名列第一、二位；“亚博卢”集团可能居第三位；自由民主党最好情况下可获5—6%的选票，更大的可能性是进不了杜马；作为中右政党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不可能进入杜马；右翼力量联盟也难以进入杜马，得到5%的选票而进入杜马的可能性最多50%。

杜马选举各政党得票率的可预测性要大于总统选举。两种选举并不完全一致。就是说，参选总统的各党派代表人物的得票名次同其政党在杜马选举中的得票名次常常不一样。因为总统是全民直接选举，个人因素很起作用；其次是因为有一部分选民不属任何党派，但他们常常只有在各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中进行选择；第三还因为总统选举与杜马选举时间相隔半年，其间政局又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目前国内外的预测，在总统选举第

一轮中，名次排列依次为：普里马科夫（中左领袖）——久加诺夫（俄共领袖）——普京（现任总理）——亚夫林斯基（中右的“亚博卢”集团领导人之一）——列别德……。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普里马科夫占明显优势，当选总统的可能性最大；久加诺夫不可能当选；普京变数很大，目前地位在迅速上升，但车臣问题局势和结果难以预测，叶利钦、克里姆林宫对总理看法和态度可变性极大，也难以预料。现在离总统选举还有半年多。在现在往前推的半年中，叶利钦就两度撤换政府总理，所以现在下断语为时尚早。

上述问题不是本文重点，只是简单归纳一下目前的一般预测。

二、叶利钦执政年代的结束 不等于“叶利钦时代”的结束

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和非常事件，叶利钦的执政年代就将结束了。

这里没有用“叶利钦时代”，而用“叶利钦的执政年代”。这不只是字面上有所差别，内容和意义也有不同。口头上随便说说，用“叶时代”也无不可。但“叶利钦时代”是什么？

叶利钦并非孤立的个人。他代表的是一个阶层，一种政治势力，一种社会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叶利钦时代”，就应该说，“叶利钦时代”就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即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经过戈尔巴乔

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转向西方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体制的“时代”。

人们在说“叶利钦时代”即将结束时，一般是从贬义上来说这个“时代”：国力衰落，国威丧失，政局动荡，社会混乱，经济滑坡，民不聊生等。然而，叶利钦将要留下的“遗产”，并不只是上述黑暗面。这份“遗产”还包括：俄罗斯打破苏联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私有化为方向，形成了各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结构；摧毁了苏联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使俄国确立起市场经济框架；结束了苏联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实行对外开放，使俄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步接轨。在文化上，俄罗斯抛弃了以统制主义为特征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一元文化，形成了向西方开放的多元文化，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叶利钦时代确立起同苏联政治体制根本不同的另一种政治制度框架。这种政治和政治制度，以学习西方的多党议会民主政治为目标和取向，但深深打上俄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烙印、社会转型期的烙印、叶利钦个人秉格的烙印。其特点是：

三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而实际上是总统集权专制，议会软弱无力，司法权力微小；

多党制已成定局，政治格局已较明朗，但政党政治尚未形成，是政党政治与精英政治的混合；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中间道路”的思潮互相对立、渗透，但社会主义在重大制度和发展道路上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识；

中央与地方关系松而不散，统而不一，尚未完全定格；

社会民主、政治自由与金融寡头对政治的控制、黑社会势力对社会和百姓的控制、危害同时存在。

叶利钦执政年代的这些政治“遗产”在叶之后总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它不可能完全被抛弃，不管什么政治势力和代表人物上台主政。

三、叶利钦的统治何以能够维持？

从1990年5月叶利钦入主白宫至今整整9年。1998年，俄国GDP已降到世界的第17位，不到美国的6%，我国的一半。至少 $\frac{1}{3}$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富差距大大超出通常认为的10:1的社会安全警戒线。社会腐败现象泛滥。金融寡头左右政治、影响决策。多达10万之众的黑手党渗入或控制半数以上的国企和银行。连连的政府危机也使社会深受其害。从1998年3月起的一年半内，叶4度撤换总理。

俄罗斯社会、俄国人为什么接受叶利钦这样一个人霸居政坛达9年之久？其实，叶这9年也不是稳坐俄国权力的顶端。他危机频仍。9年中，他至少经历了5次政治危机：

①91年“8·19”举事，矛头与其说对着戈尔巴乔夫，不如说是直接针对叶利钦，那是生死存亡之战。

②93年议会与总统对峙对抗甚烈。3月叶曾发布告公民书，要实行总统“特别治理”，最高苏维埃曾决定弹劾叶利钦。

③95年杜马选举、96年总统选举。由于连年社会经济危机，叶在选举前在民意测验中支持率跌到7%左右。

④97年底开始的金融危机导致连续的政府危机：98年3月叶免去了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职务，提名基里延科为总理两次遭杜马否决；8月他又解除了基里延科的总理职务，提名切任总理又被否决。所谓政府危机其实也是叶的统治危机。

⑤今年5月解除普里马科夫总理职务前又面临被弹劾的困境。今年以来，叶利钦已经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什么政治集团或政治家对他感兴趣，在民意测验中支持率近乎为零。

那么，叶利钦为什么能够逃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呢？或者说，叶利钦凭什么稳住了他的总统宝座，所谓的“叶利钦现象”是怎

么回事?

①**法律保证**,即在非常情况下制定了总统制的新宪法,确保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叶维持自己不稳固权位的法律保证。

何谓“非常情况下”?一是指叶利钦利用1993年4月全民公决后的政治主动权,把人代会、最高苏维埃、主张议会制的议长哈斯布拉托夫等人排除在制宪的主导地位之外,自己主持召开制宪会议;二是指在叶利钦炮打白宫,以武力镇压了反对派之后的社会政治气氛之下进行新宪法草案的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

所谓“至高无上的权力”集中体现在总统解散国家杜马的权力和控制政府的绝对权力。1998年4月,国家杜马通过对基里延科的总理任命典型地说明杜马由于害怕被解散而不得不屈从于总统的意志和权力。议员历来怕杜马被解散,因为他们在工资、住房等方面有种种特权,丢掉乌纱帽就失去既得利益。对政府的绝对控制权力使叶利钦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解散政府、撤换总理来推卸责任、转移视线、玩弄杜马。如今年5月叶解散普里马科夫政府,一方面是由于在叶心目中,普不是“自己人”,叶普在方针政策上不同道;另一方面则是叶在面临国家杜马启动弹劾总统程序的紧急情况下而采取的保全自己、先发制人的措施。我解散“中左”的普里马科夫政府,提名“自己人”任总理,你杜马要是三次不通过我就解散杜马。结果叶利钦由被动变为主动。

②**社会基础**,即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培植起来的金融集团和私有者阶层,是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势力维护其权力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在俄国,政治转轨是其经济改制的前提和保障;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又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多元政治奠定了越来越宽厚的社会基础。在民主派与共产党,叶利钦与久加诺夫的政治较量中,在市场化 and 私有化中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其中的暴发户

——“新俄罗斯人”,当然是站在叶为代表的民主派一边的。1996年总统选举投给叶利钦的4000万张选票,不能说都属于暴发户和私有者阶层,但没有在经济转轨中发起来的阶层作为基础,上述投票结果是不可设想的。而财团耗巨资支持政权党、支持叶竞选并不是什么秘密。暴发户和私有者阶层的政治能量不能简单看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他们的能量比在人口中的比例要大得多。据称俄国“新俄罗斯人”有50万,而1995年私有小企业共有90万家,个体农户有28万户。加上“官僚集团”——新权贵阶层(在地方政权机关中80%是苏联时期的“干部”),“上流社会”比起以雇佣劳动者为主体的“下流社会”(约占全部社会成员的一半还多)人数要少得多,但他们有钱财,有权势。在俄共和民主派中进行选择,他们中的大多数的政治态度是不言自明的。

③**一手握着枪,一手举着民主旗帜**。前者指以“东方的方式”、手段,即以强力对付政敌。1993年10月炮打白宫,解决两权的方针、政策分歧、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同时利用这种形势制定和通过新宪法,即为典型。至于在平时的政务活动和重要人事安排中所表现出来的总统独裁倾向,更是带着鲜明的东方色彩。这应该说是叶维持权力的重要一着。如果按正常的“民主”机制运转,不少危机他是逃脱不了的。但叶是以“民主斗士”的面目登上政治舞台的,“民主”是他用以摧毁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旗帜,因此他也不可能公开抛弃这面旗帜。炮打白宫之后,还是全民公决,“自由选举”杜马;95年、96年大选毕竟还是按期举行。叶利钦搞起来的“民主制度”对他自己似乎也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和威慑作用。这就是造成俄国民主旗帜高高飘扬,独裁专制大行其道的怪现象。

这里特别要指出,关键时刻举着反共旗帜是叶利钦保住权位的重要原因。作为从苏共反叛出来的反共旗手,叶利钦最害怕、最担

心的就是共产党东山再起,因此他视共产党为最主要敌手,始终不忘记把打击的矛头对准共产党。解散议会以及炮打白宫以后,叶的主要打击目标就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1996年总统选举,久加诺夫成为叶的最主要对手,叶更是大张旗鼓地利用他们手中的舆论工具重现30年代大清洗的情景,制造恐共气氛,置俄共于难以争辩的被动地位,这是共产党难以东山再起,叶利钦获胜大选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当中左已成为民主派的主要威胁时,克里姆林宫仍不含糊地声称其对手是俄共为首的左派。民主派的政治觉悟是很高的。

④**全民总统的面孔,灵活多变的策略。**尽管叶利钦对俄共等左翼派别有极高的政治警觉性,表面上还是竭力淡化自身的党派色彩,以全民总统的面目出现。叶利钦实际上始终是右翼的领袖,但他本人超脱于党派之外,政治上同右翼政党和集团保持距离。他一方面毫不犹豫地重用一批一批的右翼政治骨干,另一方面又根据维护自身权位需要,舍车保帅找替罪羊,不断撤换昔日的战友、大小伙伴和亲信,盖达尔、科济列夫、丘拜斯、基里延科等等都是此类人物。对这支队伍,叶利钦想用就用,想撤就撤,使自己可进可退,可攻可守,似乎一贯正确。

叶利钦个性顽强,可以说,他几年来对于私有化、市场化、政治多元化这些目标未见动摇过。但他同时也善权谋、多机变,为达目标,不择手段。这方面,他比戈尔巴乔夫更像个“政治家”。他该出手时就出手,绝不手软;该妥协时就妥协,并不僵硬。1993年3月,叶曾宣布实行总统“特别治理”,招致最高苏维埃决定对他实行弹劾。最后叶承认自己违宪,放弃“特别治理”,换取了人代会放弃弹劾叶的提案。切尔诺梅尔金作为温和改革派、普里马科夫作为新杜马中左派集团支持的人物,叶利钦并不喜欢他们,但迫于当时形势,他不得不提名他们任总理。1996年总统选举前,叶

公开声明不言“主义”和“道路”,第一轮选举后不失时机地同列别德结盟,是他得以连任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

叶利钦这种超党派面目和灵活的手段,既适应了俄社会转型期、过渡期的政治格局、政治发展趋势,客观上也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稳住了自己的总统地位。

⑤**民情。**上述第3、第4点我们是从叶利钦的统治手法来讲的。还可以从民众这方面讨论叶维持统治的原因。多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已越来越清楚:叶利钦对于俄罗斯,已经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人物了。俄国老百姓何以一再容许这么一个从身体到心理都处于病态中的人占居权力的顶峰?原因在于:第一,俄国人民太习惯于个人独裁和专制统治了;第二,也许还要怪他们有太强的忍耐力;第三,他们既无“合法”的手段(叶的统治权力并非不合乎其宪法规定),又不无道理地厌倦街头政治(街头示威游行也难以把叶轰下台);第四,他们对叶丧失信心,多数也仍对俄共不放心,他们或许正在等待一个主张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好处捏在一起的政治集团和政治家降临?

这样的政治势力——中左终于出现了。他们果真能不负众望吗?

四、叶利钦执政年代的结束,可以说明 照搬西方模式不行,但还不等于 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俄国的破产

这么说有以下几点理由:

(1)叶利钦现在成了孤家寡人,并不能简单说是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果(照搬西方民主制度也肯定不会有好结果),而恰恰是其搞独裁和专制的结果。叶在这方面的政治品格体现的正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中落后的传统。这种做法受到反对说明俄罗斯社会、俄国民众希望在这方面有所进步。在叶之后,俄罗斯可能在建立权力制衡体制方面有所进步,

即通过修宪扩大杜马和政府的权力、设副总统,限制总统的权力。人们也常说,俄国社会需要、民众也习惯于有一个铁腕人物来扭转局面。这似也有道理。二者如何结合,还有待在实践中观察。

(2)民主派力量的削弱并非完全是必然的,其原因之一在于叶利钦在其不健康心态支配下采取的错误决断。叶利钦总是担心手下的人威信比自己高。这种嫉妒心理使他不能容人。撤换切尔诺梅尔金便是一例。切氏当然威信并不算高。但如果叶不解散切政府,或许“家园”不致于落到现在这种境地。叶利如此频繁撤换总理,客观上也许使不少人有机会登上高位,为日后再展才干积累了政治资本,但叶利钦的许多做法都使民主派一再分裂,现在则是各行其是,群龙无首。

(3)说叶利钦时代的结束不等于西方制度在俄国的破产,还有一个理由:(根据现在多数人的预测)中左上台,也不是恢复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声称走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好处揉合在一起的“第三条道路”,其实倾向的是资本主义。他们不可能废弃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和多种经济成分这些基本制度,外交上更不可能改变现在维护俄罗斯大国地位和促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方向。现在民心所不容的也不是这些东西。

俄罗斯社会发展的要求、民众的愿望,要结束的是政治上的总统独揽大权,病态的个人专制、“犯罪市场经济”、“野蛮的资本主义”,却不是反对多党议会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他们反对软弱的外交,希望重振俄国雄风;厌恶官场腐败,盼望清廉政治;厌恶动荡和混乱,盼望稳定和秩序;不赞成贫富悬殊,希望平等和公道等等。

(4)不能低估右翼的力量和影响。现在事实已说明,在俄国的政治派别中,三个极端——极左、极右、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已失败,或看不到前途。用“俄国人爱走极端”来预测

未来社会走向看来不行。今天恰恰是: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造成中左有希望成为主流派别,但我们还不能低估右翼的力量和影响。这里主要指国际环境、国际潮流的作用。而讲国际对俄的影响也不是指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民主派的直接支持。西方、特别是美国态度、立场历来不含糊——支持右翼,反对左翼;但他们很实用、很精明。他们当年曾经很支持戈尔巴乔夫;看看戈氏大势已去,立即毫不犹豫地转而支持叶利钦。一切以其利益为转移,他们不讲“义气”。

国际影响主要指时代的潮流,全球化条件下的民主化潮流。西方文化和俄民族文化的关系:融合是主要倾向,主要趋势,冲突不可避免,但这是必然相伴相随产生的现象。不必讳言:原苏东国家的改革,本身就是一次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明成果的自觉行动。以现代科技为根本动力的西方扫向全球的文化浪潮,必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从而将深刻的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苏东国家的面貌。想完全拒绝西方文化与想全盘西化的政治势力同样没有前途。自觉迎合和配合西化潮流的是右翼势力。

8年来俄国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走势是:激进的民主派让位于温和的民主派(中右)、温和的民主派将让位于中左派。俄国政治格局不一定就在此定格。即使未来的大选使右翼完全败北,他们也将随时会有卷土重来的冲动和可能。西方文化在俄罗斯经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涨潮,现在处于消退时期,但回潮的可能性很大,甚至是难以避免的。

即使讲叶利钦下台,我们用的也常常是假定式、将来时。对整个右翼的政治前景,说话更需留有余地。他们毕竟有较之左翼和中左大得多的物质条件 and 政治资源。

(1999年11月中旬)

附：

悼 杨 淮

上文为践杨淮生前之约而作。撰文间，杨淮的音容笑貌一再浮现在我眼前。使我顾不得得体不得体地要写下几句悼念的文字。

他离开我们说话就一个月了。

他走得太早太早，太突然太突然了。他完全来不及对家人、对同事、对朋友作点交代。

那天，10月16日。全院体检。在他的办公室，算是我们最后一别。他很轻松地告诉在场同事：“我检查完了，没事，心电图也没问题。”粗心的我们竟没有听出他对自己的心脏原有隐忧，哪里想得到当天夜里他就走了。

当王其芬电话里告知我这一不幸消息时，我竟失态地惊叫起来，把家人也吓着了。我这个并不算太脆弱的人竟要他们来劝慰我“不要太难过”。家人知道我同杨淮他们夫妇的交往。作为比我年长的朋友，他们家是我每年春节期间必定要去看望的家庭之一。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家人更知道我两周前刚刚万里奔丧，送走我情亲如父的三叔，心境还未调整过来。

院里告诉我，陈瑞兰教授很悲痛，不希望大家来电话。我顾不了这些，只想问个究竟。我也相信老陈的冷静和坚强。她在电话里同我诉说了杨淮走时的

情景。我劝她先到孩子家暂住一段，她说她哪儿都不去，杨淮的卧室她还没收拾，她就守在家里。她说，“你也别太伤心，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你每次去看他，你们谈了什么，杨淮回家总是高兴地学一篇。有时说，黄宗良今天来了，没说什么，看了看走了……”

是啊，多少年了，这已经成了习惯。每次到系里，我总是要到他办公室看一看。他总是把椅子挪一挪，戴上眼镜，点上一支烟，然后我们轻描淡写地说说各自的事。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常务副主编，他总是要说一说刊物的事，听听我这个爱管点“闲事”的热心的作者和读者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交往，其实平淡如水。可是今天他走了，我顿觉失去的是——不管是政治第一的当年，还是个人名利第一的今日，都是不可多得的知己、知音。

杨淮走了，他留下了什么？一年四期的院刊，每年一部的论文集，后来又加上不定期的“简讯”，研究生论文集……每年都是超过100万字的工作量，在一般单位，这是一个三个人的编辑部要做的事。在院（系）领导下，具体的组稿、审稿、改稿、编辑、出版种种事务，他独自一个人完成了。我知道，他是一字字、一句句、一篇一篇文章看过

* 黄宗良教授的这篇追思文章，深情叙述了他与本刊常务副主编杨淮生同志的多年友谊，本刊予以发表，借以表达我院师生对杨老师的深切怀念之情。

来的。严冬盛夏，老师们放假在家了，他还是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默默地忙着。局外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退休返聘的人。

杨淮走了，作为院刊的积极撰稿人和关心者，我突然感到他的去世对于我们院确是一个不能算小的损失。

杨淮留下了什么？在于实迹，更在于精神。非常的认真负责，不求索取，有想法不发牢骚，有成绩不事张扬，淡泊名利，默默工作。在社会上人们正热火朝天争名逐利弄权的时候，他处之泰然、漠然。

试想想，他这么做图的什么？他家并不缺钱花，晋级提薪也已与他无关。是他对这份工作有天然兴趣？也是也不是。有时他也兴奋得失眠；有时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工作需要，领导一说，他把自己的困难搁一边。

有的老师说他就是“老黄牛”。他孩子说，“我爸是累死的。”老陈不让孩子这么说。她说，杨淮九泉之下听到这么说不会高兴的。我们都很熟悉司马迁有过“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说法。毛泽东引用了它，提倡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杨淮生同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月来，我老在掂量，确实感到他可以算是这样一种人。每想至此，甚感惭愧。我知道，他对我有时发的牢骚并不以为然。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有时会把我们搞昏了头，有时甚至习是为非，视利他奉公为愚钝，弃义德如敝屣。两相对照，杨淮的这种精神尤其显得有分量。

那天我们送他上路，我禁不住地上前扶棺，双臂和心情同样沉重。我心里默默念叨着，老朋友，您走好，原谅我不能再送你一程。

灵车走了。送者怆然。我忽然想到，难道他就没有什么话要留下，没有什么愿望要提出来吗？

有啊！我后来得知，他想有机会能到国外看一看，但他从未提出来。在我院许多人出国习以为常的环境中，这个要求半点也不过分。他出去过吗？是的，出过。到过朝鲜。那是抗美援朝时期。至今他腿上还留着伤疤！

杨淮他走了，化作一缕青烟，飘然西去……留给我们的无尽的哀思。

一个月来，我常常走过他的办公室，我太想太想推开紧闭的房门：他还在那里。他又把椅子挪了挪，戴上眼镜，点上一支烟……然而，“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但我深信，我们院刊这个科研园地不会是“草径苔荒不可寻”的。

杨淮精神不死！

（1999年11月18日深夜）